学思践悟习近平法治思想

前沿法评

编者按 9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立足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针对民刑交叉案件审理中的重大疑难问题作出规定，切实回应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民刑交叉纠纷解决规则的进一步完善。为更好理解和适用相关司法解释，本栏目特刊发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王利明，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署名评论文章。敬请关注。

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规则的发展完善

中国法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王利明

所谓“民刑交叉案件”，即同一行为同时受到刑法规范和民法规范的调整，民事纠纷与刑事犯罪相互交织、关联的案件。近年来，民刑交叉案件逐渐增多，但是相应的法律适用规则供给不足，存在不少空白地带，使得案件处理难、处理慢、处理效果不好的情况时有发生。特别是受“重刑轻民”传统观念的影响，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不当扩大“先刑后民”适用范围的倾向，且简单将刑事规则套用于民事案件，产生了以刑事处理替代民事救济的现象，甚至为以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提供了便利。针对这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以下简称《规定》）。《规定》立足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针对民刑交叉案件审理中的重大疑难问题作出规定，切实回应了司法实践的迫切需求，推动了民刑交叉纠纷解决规则的进一步完善。《规定》有不少亮点，应当予以充分肯定。

将法秩序统一融入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的基本要求。法秩序统一是指在各个法律部门中，法律评价应当具有一致性，不能相互冲突和矛盾。这不仅关乎法律体系内部逻辑与价值的一致性，也关乎法律适用的统一和裁判结果的可预期性，是解决民刑交叉问题的逻辑起点和必须秉持的价值理念。此次出台的《规定》较好地贯彻了法秩序统一的理念。一方面，该解释要求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时应当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有利于促进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即“一个注重、三个有利于”）。这实际上就是将坚持法秩序统一确立为人民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指导原则。另一方面，该解释的具体规定也都较为充分地体现了法秩序统一的要求。例如，《规定》区分了“同一事实”与“关联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将民刑交叉案件划分为竞合型民刑交叉案件和关联型民刑交叉案件，相应设置不同的处理规则。如果并非“同一事实”而是“关联事实”，刑事案件的审理不应当影响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推进，这就实现了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在救济民事权利上的分工配合、统一协调。应当说，此种区分处理的思路是较为科学合理的，也具有可操作性。又如，《规定》明确了哪些情况下涉刑民事案件应当受理以及如何审理，建立了分别审理下的信息通报、在民事诉讼中推翻刑事判决认定事实的函告以及民刑生效裁判在执行程序中的衔接等机制，完善了涉刑合同效力的认定规则，从而清晰划定了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边界，协调了刑法规范与民法规范对同一行为的评价，有助于防范、化解民刑程序冲突、裁判结果冲突。

将民刑并行确立为民刑交叉案件处理的重要原则。人民法院在审理民刑交叉案件时，首先需要明确，如果民事案件事实涉及刑事犯罪，法院究竟要不要受理，已经受理的要不要驳回起诉。对于刑民涉及同一事实的民刑交叉案件，“先刑后民”原则的适用自有其合理性。但是实践中，个别法院固守“先刑后民”的思维，只要民事案件涉刑，就不加区分、机械地驳回原告的起诉，或将民事案件长期中止，影响了民事纠纷的及时有效化解。甚至有的债务人利用“先刑后民”恶意拖延债务履行，导致债务纠纷一拖数年；有的企业为了逃避违约责任，以其法定代表人或者代理人涉嫌刑事犯罪为由，主张“先刑后民”，拒绝履行合同，甚至随意否定合同的效力。总而言之，由于缺乏清晰的规则，“先刑后民”的做法有时被滥用而异化为“以刑止民”，阻断了对被害人民事权利进行司法救济的正当渠道，损害了当事人的正当权益，甚至造成一些债权人项目被“拖黄”、企业被“拖死”，成为影响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堵点。此次出台的《规定》明确将“民刑并行”作为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重要原则，规定当事人基于与涉嫌或构成犯罪的行为有关联，但并非同一事实提起民事诉讼，符合规定的情形时，法院应当依法受理。《规定》将应当适用“民刑并行”规则的情形置于适用“先刑后民”规则的情形之前予以规定，并明确了“民刑并行”下的民、刑程序衔接规则，如案件审理、中止诉讼、线索移送、事实认定和证据采信、执行衔接等规则，有利于保障当事人的民事诉权，从制度上杜绝恶意拖延诉讼、规避债务的乱象，实现了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统一。例如，针对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问题，《规定》明确，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有关机关以其对民事案件所涉事实已经刑事立案为由，要求将案件移送其处理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实质审查，经审查认为民刑案件不属于同一事实的，应当遵循民刑并行原则，继续民事案件的审理。

明确涉刑并不当然导致合同无效这一一般规则。涉刑合同效力认定问题是民刑交叉案件审理中的一大难题，此次出台的《规定》针对涉刑合同效力作出了细化规定，从如下三个层面实现了刑民实体规则的有效衔接，填补了长期存在的规则空白：

一是否定了“涉刑即无效”的陈旧观念。有观点认为，只要订立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涉及刑事犯罪，即应当否定合同的效力。此种观点将导致刑事制裁不当介入合同效力认定，大量的合同被认定无效，这既不利于经济良性发展，也不利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针对该问题，《规定》第十七条明确规定：“行为人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有关合同的效力以及是否对被代理人等发生效力应当依照民法典的规定认定。”这就改变了“涉刑即无效”的观念。以骗取贷款行为为例，如果在缺乏足额担保给贷款人造成严重损失时，以借款人构成犯罪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则基于担保从属性原理，相应的担保合同也应当属于无效合同，反而限制了贷款人从本就不足额的担保中获得补偿的机会，进一步扩大贷款人的损失。相反，如果债权人未主张撤销，认定借款合同有效，则有利于维持担保合同的效力，从而维持金融秩序的稳定。此前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即对涉刑合同效力采取了独立评价的立场，但其仅适用于民间借贷纠纷，此次《规定》将该规则推广适用至民间借贷纠纷之外的其他合同领域，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理信赖，维护交易秩序。

二是明确涉刑合同法律效力认定规则。在明确涉刑合同并不当然无效的基础上，《规定》第十八条至第二十条进一步将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效力认定规则归纳为涉及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涉及合同诈骗等犯罪以及涉及职务侵占罪等三种情形，分别对相关的合同效力认定规则及单位责任作出了规定。针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者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损害法人、非法人组织利益构成犯罪的情形，《规定》明确，其不属于民法典第一百五十四条所规定的恶意串通导致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情形，而属于滥用代理权的行为，同时还明确法人、非法人组织依法享有追认和请求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代理人与相对人承担连带责任的权利。针对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他人名义订立合同构成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犯罪的情形，《规定》区分相关行为构成有权代理、表见代理或者狭义的无权代理等不同情形，并在此基础上认定合同效力。针对涉职务侵占等犯罪的合同效力认定，《规定》明确，合同相对人有权主张合同对法人、非法人组织发生效力。

三是细化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与责任承担规则。在债务人订立主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时，为避免一概由担保人承担责任，《规定》第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了涉刑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与责任承担规则。该条第一款是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至第一百五十条等对可撤销法律行为的规定在民刑交叉领域的具体适用。该条第二款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十七条规定的基础上，细化规定了确定担保人过错大小的因素，明确规定应当综合考虑担保人的职业身份、认知能力以及其与债务人之间的关系等因素确定担保人有无过错及过错大小，并在此基础上依照相关规定确定其责任。该条第三款进一步规定，债权人未尽合理审查义务，对订立主合同及损失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适当减轻担保人的责任。该规定也是过失相抵规则在民刑交叉案件中的具体运用，有利于合理认定担保人的责任。

除上述三个方面外，《规定》中关于案外人对涉案财物权属争议、刑破并行、人身损害的先予救济、民事裁判执行过程中发现涉及犯罪的处理等规定，都反映出这部司法解释是一部秉持为民初心、破解实务难题的重要司法解释。当然，应当看到，民刑交叉问题本身较为复杂，且民、刑两大领域的裁判理念客观上存在很大差异，这也决定了该司法解释在解决民刑交叉纠纷方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为进一步明确民刑交叉法律适用问题，配合该司法解释的适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将来也可以根据实践需要，通过指导性案例或者其他方式，明确附带民事诉讼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之间的关系，刑、民赔偿标准以及赃款赃物的善意取得等问题，为法官在具体个案中准确适用法律，妥当解决民刑交叉案件提供必要的指导。

总之，《规定》为化解涉刑民事纠纷提供了更加系统、具体的裁判依据，推动了涉刑民事纠纷解决规则的完善，将为依法公正处理民刑交叉案件，充分保护各类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营商环境的改善，发挥积极作用。

妥当处理民刑交叉案件 切实维护法制统一

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周光权

宪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将该规定放到民刑交叉案件处理这一特定领域加以理解，就是如何坚持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问题，即从我国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整体法秩序出发，在刑法、民商法等多个部门法中，对同一法律事实的规范评价、价值判断应当具有一致性，不能相互冲突和矛盾；否则，法律的行为指引功能就会丧失，人民群众将无所适从，进而损害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基于此，实务中就必须建构具有体系性、妥当性的解决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规则，以切实避免民法与刑法在解决复杂纠纷时产生评价矛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26〕19号，以下简称《规定》）的制定，是人民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聚焦主责主业，及时化解社会矛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准确贯彻落实宪法规定，精准、系统把握民事、刑事两大领域的实体法和程序法内在精神，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和尊严的生动实践。

《规定》的问题意识强烈。在较长时期的民事审判实务中，民刑交叉案件的办理存在一些难题，困扰着当事人和法官。从民事诉讼当事人的角度看，其对通过民事诉讼维护自身权利充满期待，但有的案件以涉刑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有的案件因被告人涉刑而中止审理、久拖不决，被害人保护自身合法权益的需求难以得到及时回应，当事人“告状无门”。从法官的角度看，其在办理民刑交叉案件时，究竟是选择刑事优先还是民事优先，在面对双方当事人的不同诉求以及其他机关的移送申请时，确实会因为作出决断的规范依据缺乏而陷入两难境地。《规定》直面这些难题，系统总结实践经验做法，全面梳理法律、司法解释及相关文件规定，着力解决民刑交叉案件法律适用规则供给不足的问题，形成了统一的、具有内在逻辑的规则体系，开宗明义地提出应当区分是否构成同一事实，采取不同的处理方式，避免民事案件只要有“涉刑”因素就径行裁定驳回起诉、刑事一概优先的偏颇做法。例如，对于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名义订立合同的行为构成犯罪，相对人请求未构成犯罪的法人、非法人组织或者他人承担民事责任这一民刑交叉案件中的常见情形，如果一概以涉刑为由驳回起诉，无论是追缴、责令退赔还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等程序，显然都无法解决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民事责任问题，不能全面及时有效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故《规定》第三条明确，对于此种情形，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同时，《规定》进一步丰富了处理民刑交叉案件的程序适用规定，特别是对当前反映较为突出的以刑事手段插手经济纠纷，随意中止民事诉讼，以及民事程序对刑事案件事实的认定和证据采信、对刑事涉案财物的权属争议处理等问题，相关规定较为详尽。总之，《规定》全面梳理以往的争点，坚持人民至上的理念，始终聚焦实践难点、堵点，问题意识明确、强烈。

《规定》措施得力、针对性强。一方面，形成了适用于所有民刑交叉案件的一般性法律适用规则。其中，主要是程序衔接的处理规则，也包括实体认定规则。比如，明确以“同一事实”作为区分先刑后民、民刑并行的标准，避免实务中不区分情况，笼统适用先刑后民的做法。在很多案件中，民法和刑法所评价的事实原本就是不同的，推行民刑并行是妥当的。这主要是考虑到刑法是保障法、“第二次法”，其与民法发挥作用的领域有所不同。仅当法律事实同一时，才有必要采用先刑后民的做法。例如，甲通过欺骗方式与乙签订合同，后甲因携款潜逃而构成合同诈骗犯罪，此时，先刑后民显然是妥当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可以直接通过追缴、责令退赔程序予以救济，无需对甲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规定》对于程序选择的明确，消除了以往理论和实务上的诸多争议。另一方面，《规定》对实践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予以明确。比如，针对利用刑事手段违法干预民事纠纷的棘手问题，《规定》明确，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民刑案件不属于同一事实的，应当遵循民刑并行原则，民事案件应当继续审理。同时规定，人民法院发现刑事追诉不当的线索、证据材料的，应当及时移送有关机关。又如，针对实践中有些地方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时，直接采信关联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证人证言等言词证据等突出问题，《规定》明确，如果相关证据材料未作为刑事案件的定案根据的，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应当组织质证并决定是否采信。当然，《规定》也作了适当“留白”。这主要是考虑到民、刑两大领域的违法行为认定条件、证明标准、司法理念客观上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涉案财物的善意取得问题较为复杂，这次就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总之，《规定》对复杂问题的处理得当，积极回应实务关切，最大限度地提供实务指引。

《规定》符合法理。在第一条开宗明义提炼出人民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必须“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的要求，这个理念指引实际上就是对法秩序统一性原理的坚守。一般而言，刑民的判断不能有根本性冲突。例如，针对甲伤害乙并造成人身损害的行为，不能出现生效刑事裁判认定甲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而相关民事案件径行认定甲并未实施故意伤害行为，否则，就有违法秩序统一性原理。当然，法秩序统一性并不排斥不同部门法对个案进行具体处理时，在违法性判断上的差异性、相对性。即便案件事实是基本相同的，由于刑法与民法的规范目的不同，对案件事实的凝练和评价不同，要件事实也会存在一定的差异，进而导致二者对基本相同的案件事实评价上的差别。这就意味着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在民法上并不一定导致合同无效。例如，行为人骗取金融机构贷款构成犯罪的，应当追究犯罪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但不能据此一概认为借款合同无效。否则，发放贷款主体的利益就无法得到保障。当然，实践中处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担保合同纠纷时，问题就更加复杂，对此也不能僵化适用担保规则，否则会造成担保人承担的责任过重。为此，《规定》对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作出专门规定，即符合以下情形的，担保人在法律规定的权利行使期间内可以请求撤销担保合同：主合同的债务人以欺诈手段使担保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债权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主合同的债务人以胁迫手段使担保人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债权人在与担保人订立担保合同时存在欺诈、胁迫等可撤销情形的。上述规定，旨在规范和指引人民法院在裁判案件时注意对担保合同本身效力的审查。可以认为，《规定》对许多复杂问题的处理很好地坚持了系统思维，有效贯彻了法秩序统一性原理。

《规定》的适用范围、适用场景都较为广泛。一方面，《规定》对刑事案件的办理直接或间接提供了部分实体性的规则指引。例如，《规定》的多个条文对诈骗、合同诈骗、骗取贷款等情形下，如何实现民刑并进作出了规定，这事实上明确提示人民法院在办理民刑交叉案件时，除了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外，还要关注当事人民事权益的保障问题。又如，《规定》第二十条的规定，对行为人以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义订立合同，将取得的财物非法占有或者挪用，被生效刑事裁判认定为职务侵占、挪用资金等犯罪的情形，明确了法人、非法人组织的民事赔偿义务。另一方面，《规定》对不同办案机关之间的配合、衔接机制、信息交流机制也作了安排，使得刑民协调有了更加完善的机制保障。例如，《规定》第四条规定，如果民事案件基本事实的认定必须以刑事案件的审理结果为依据，而刑事案件尚未审结的，应当依法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并和其他办案部门保持沟通、了解刑事案件进展。

总之，《规定》基于强烈的问题意识，针对当前司法实务中反映最为强烈的民刑交叉问题建构规则，着力解决民刑交叉法律适用中带有普遍性、争议性的突出问题，有利于统一裁判规则，加强审判监督指导，更好推动公平正义目标要求的实现。

人民法院 凡人小事

“阿姨只是想听听你心里的真实想法”

韦德涛 文/图



图为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史庄人民法庭法官孟利芳与吕某某交谈。

“小朋友，阿姨只是想听听你心里的真实想法，你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近日，河南省获嘉县人民法院史庄人民法庭的调解室内，法官孟利芳坐在一个八岁男孩子的身边，与他亲切交谈，慢慢打开孩子的心扉。

2017年，吕某与李某登记结婚，婚后育有两个儿子。2026年8月，吕某以感情破裂为由将李某诉至获嘉法院，请求判决离婚，并要求两个孩子均由自己抚养。

案件受理后，孟利芳了解到李某虽同意离婚，但在两个孩子抚养权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双方都想要孩子，又都不让步，案件调解陷入僵局。

孟利芳考虑到，案件的症结不在夫妻感情破裂，而在于两个未成年人孩子的归属，考虑到双方的大儿子吕某某已满八周岁，依法应充分听取并尊重其真实意愿。孟利芳随即向双方释明法律规定，建议将吕某某带到法庭，听听其内心的想法。

调解当日，没有对席而坐的紧张气氛，只有法官和孩子面对面的轻声交流。“你平时不开心、受委屈的时候更愿意找爸爸还是妈妈诉说？”一提到父母，吕某某低下了头，“我更愿意找我爸爸”，随即又说“妈妈比较忙，总是带着弟弟……”“那你更愿意长期跟着爸爸还是妈妈一起生活？”孟利芳又跟着问了一句。孩子坚定地回答：“爸爸！”随后又改口说：“我也想经常能看到妈妈。”一个个平常的话题，一场心灵问答。孟利芳与吕某某谈过话，将孩子的内心想法说给了吕某与李某，原本情绪比较激动的两个人一下沉默了。

孟利芳见状，从两个孩子的生活环境、教育保障、情感需求等角度切入，反复疏导沟通。每一次耐心调解，法官都在苦口婆心地劝说，努力让双方当事人敞开心扉，互相换位思考，寻求最妥善的结果。

“法官，我们尊重孩子的选择，无法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就给孩子一份完整的爱！”经过几轮调解，最终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吕某与李某离婚，长子吕某某由李某抚养至十八周岁，次子由吕某抚养至十八周岁，抚养费各自承担，双方互享探望权，各自名下财产归各自所有，各自债务各自偿还。最终，离婚纠纷所涉及的婚姻解除、子女抚养、财产分割等争议均得到妥善解决，法官以司法温情最大限度降低家庭变故给孩子带来的伤害。

婚姻落幕，温情不散；监护变更，关爱不减。在法槌落下之前，让孩子说出心声，这是法官的专业与担当，更是司法对每一个未成年人最深沉、最温暖的守护。

短评

依法保护消费者“差评权”

钱立功

近日，消费者李先生反映，他在一家餐馆堂食后，因觉得食材品质差、味道一般，于是在订单评价环节给出了差评。本是正常的消费反馈，李先生却遭到商家恶意辱骂，店家还多次打电话骚扰，逼迫李先生删除差评。

这类迁怒消费者的行为，不仅暴露短视的经营理念，更触碰法律红线。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的权利。遇到质量不合格或服务态度差的商家，消费者给出差评，是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任何人无权剥夺。

健康的市场，绝不容商家报复给出差评的消费者。如果这种行为得不到有效遏制，消费者将不敢讲真话，劣质商品、不良服务将充斥市场。想要构建商家接纳差评、消费者敢于给出差评的市场环境，需要多方协同发力。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要健全联动执法机制，从严查处骚扰、辱骂、泄露消费者信息等违法行为，整治强制删评、报复消费者乱象，依法保护消费者的“差评权”。同时，严厉打击有偿删评、职业差评黑灰产业链。

平台必须坚守中立底线，不得压制真实差评，完善“前台匿名、后台实名”的评价体系，杜绝随意删改评价、偏袒商家，保护消费者隐私信息，防止商家非法获取。商家要转变经营理念，理性看待差评，把负面评价当作提升质量的契机，而不是打击报复消费者。消费者也应当理性评价，客观陈述体验，不捏造事实恶意诋毁商家。

保护消费者“差评权”，本质上就是守护公平有序的消费环境。只有让真实评价能够自由发声，让恶意报复行为付出法律代价，消费者才敢于如实反馈消费感受，商家才能正视不足、提升质量，网络消费生态才能更加健康可信。